



明代文學批評史

朱東潤題



袁震宇

劉明今

著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袁震宇 劉明今 著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五

# 明代文學批評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研究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資助

封面題簽 朱東潤

責任編輯 鄧韶玉

**明代文學批評史**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之五

王運熙 顧易生 主編

袁震宇 劉明今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寄書在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5 印張 27.5 字數 566,000

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500

ISBN 7-5325-0983-4

1.48元 定價 12.40元

## 說明

這本《明代文學批評史》是王運熙、顧易生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的第五分卷，《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是哲學社會科學「七五」期間國家重點研究項目。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共七個分卷，全書有大致統一的體例，各卷也各具特點。《中國文學批評通史》規模比較宏大，力求較為全面地清理我國各歷史時期文學批評的發展過程，對曾有所建樹的批評家與論著作科學的評析，並努力發掘新史料，展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豐富多彩和燦爛成就，總結其經驗教訓，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的文藝理論，和促進文藝創作、文藝批評，提供借鑑和參考，為繁榮新時期的學術文化服務。

明代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頗為熱鬧的一個時期，流派林立，異說紛呈，各種文體的理論批評都有較大進展。在傳統的詩文領域，文人們各樹旗幟，壇坫自高。論文者或宗秦漢，或主唐宋，論詩者或標格調，或取風神。至隆慶、萬曆朝以後，門派益趨紛繁，公安派、竟陵派等各各標新立異，力反舊說，自成一家。在通俗文學領域，理論批評空前活躍，論家輩出，論著疊湧，在一些重要的理論、批評問題上，

彼此駁難，形成了衆所矚目的爭鳴局面。如戲曲批評中關於《西廂記》、《琵琶記》、《拜月亭》等名著孰爲「絕唱」的論辯，吳江派和臨川派關於「曲律」與「曲意」的大論爭，小說批評中有關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神怪小說、世情小說的藝術特徵、社會功能、文學價值的不同理解等等，綿延不絕，愈見激烈。因而郭紹虞先生有「一部明代文學史殆全是文人們分門立戶標榜攻擊的歷史」（《明代文學批評的特徵》）的論斷。這一現象與宋代有某些相似，但產生的社會根源却有其鮮明的時代特點。因爲明代是我國封建社會後階段思想文化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在朱明王朝創建開國之初的一段時期裡，隨着理學影響的深入，其弊端、其反撥之潛流亦暗暗滋生。至明代中期，心學勃然崛起。心學爲理學之別派，它直指本心，以心爲理，在流傳中日漸變化，且與禪宗、與城市商業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個性自覺的新意識相融合，匯成洶湧澎湃、色彩斑斕的晚明新思潮。明代的文學批評正是在這樣一個複雜多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上展開的。

本書即力圖從這一廣闊的文化背景出發，對有明一代文學批評的紛繁現象加以梳理，不但注重於各派各家之異，指出其理論的獨特處、偏頗處，還着力探求各派各家之同，覓索其相互影響、相互交融處。譬如七子派之「復古」與公安派之「性靈」，理論上針鋒相對，但分析評論具體作品時則並不完全相悖。唐宋派與公安派在對七子派的批評態度上頗爲接近，但思想角度却大不相同。戲曲批評中吳江派和臨川派關於「曲律」、「曲意」何者爲主的爭論極其尖銳激烈，可是他們不滿戲曲創作現

狀，意在革新的用心則幾乎是一致的等等。總之，由於明代社會文化思潮的複雜歧異，決定了其文學理論批評的紛繁多姿，論爭疊起，也決定了它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從文學理論批評的實際狀況出發，不爲成見所囿，努力開拓新的領域，如對素被忽視的傳奇小說、小品文、民歌等的批評文字，我們給予了適量的評述；對不大受人注意或被傳統成見排斥於文學批評之外的論家，如萬曆時期七子派公安派之外的一些作者，明末文社諸子，戲曲小說的批點、刊刻家等等，也都加以發掘蒐集。這些論著大都缺乏理論的系統性，有的甚至並非專門論述，只因能從一定視角對某一問題提出看法，或獨抒新見，或切中肯綮，對於全面系統地瞭解明代文學批評思想，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也都給予應有的地位。在敘述體例和論述方法方面，我們也儘量注意從實際出發，不強求一致。如第十一章《晚明的戲曲批評》中設《明代戲曲批評中的悲劇意識》一節；小說批評則按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金瓶梅》和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設節，以及最後以明人關於詞與民歌時調的評論爲第十三章，都出於對實際情況的考慮，與按批評家設置章節的一般情況有所不同。

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老前輩、老專家、我校已故教授郭紹虞、朱東潤兩位先生，生前對於本書的編寫，都深表贊同。當本書出版之際，謹表深切的懷念。

本卷詩文批評及詞論部分由劉明今執筆，戲曲小說和民歌批評部分由袁震宇執筆。全部書稿均由主編王運熙、顧易生兩位教授審定。此外，書稿半數以上章節曾分別請侯敏澤研究員和章培恆、陳謙

豫、陳多、齊森華、錢仲聯（以姓氏筆劃爲序）諸教授審閱匡正，得益良多，一併謹致謝忱。學海無涯，個人識見有限，本卷在某些方面力求有所前進，然不足與謬誤之處或許更多。謹希海內外方家與各界讀者不吝指教。

袁震宇 劉明今

一九八九年八月於復旦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

# 明代文學批評史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明代前期的詩文批評	三
第一節	宋濂、方孝孺	三
第二節	明初劉基、高棅等諸家的詩論	五
第三節	臺閣派、性氣詩派及李東陽等	六
第三章	明代前期的戲曲、小說批評	九
第一節	明代前期的戲曲批評	九
第二節	關於傳奇小說的批評	二一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詩文批評（上）	三〇
第一節	七子派復古的先聲	三〇
第二節	李夢陽、何景明	三四
第三節	七子派的其他諸家	三六



第四節	孫緒、吾謙、楊慎、李開先等	一六八
第五節	唐宋派	三三二
第五章	明代中期的詩文批評（下）	三三四
第一節	李攀龍、謝榛及後七子的興起	三三四
第二節	王世貞	二五〇
第三節	胡應麟（附徐師曾、許學夷）	二七一
第四節	王世懋、屠隆、李維楨	二九八
第六章	明代中期的戲曲批評	三三二
第一節	李開先、何良俊和關於《琵琶記》、《西廂記》、《拜月亭》的討論	三三一
第二節	王世貞《曲藻》、徐渭《南詞叙錄》和李贄	三四二
第七章	明代中期的小說批評	三六七
第一節	關於歷史小說的批評	三六七
第二節	關於《水滸傳》的批評——李贄、葉晝及其他評論家	三九一
第八章	晚明的詩文批評（上）	四四五

第一節	公安派的先驅	四三五
第二節	袁宏道	四四一
第三節	公安派的其他諸家	四六二
第四節	萬曆時期七子派、公安派之外的其他諸家	四八四
第九章	晚明的詩文批評（下）	五二三
第一節	鍾惺、譚元春	五三三
第二節	晚明諸家關於小品文的批評	五三四
第三節	謝肇淛、陸時雍	五五一
第四節	明末文社諸子	五六六
第十章	吳江派和臨川派關於戲曲理論的爭鳴	五九四
第一節	論爭的概況	五九四
第二節	沈璟和吳江派	六〇三
第三節	湯顯祖和他的追隨者	六四一
第十一章	晚明的戲曲批評	六八二
第一節	王驥德及其《曲律》	六八二

第二節	王思任、張岱和祁彪佳等晚明曲論家	七二
第三節	明代戲曲批評中的悲劇意識	七七
第十二章	晚明的小說批評	七七
第一節	關於神話小說《西遊記》的評論	七七
第二節	關於世情小說《金瓶梅》的評論	七九
第三節	關於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的評論	八〇
第十三章	明人關於詞及民歌時調等的評論	八三
第一節	明代的詞論	八三
第二節	明人關於民歌時調和笑話的評論	八五

## 第一章 緒論

明代文學批評是我國文學批評史發展中的重要一環。作為文學批評，它既與當時文學創作狀況密切相關，同時還受整個社會文化思潮的影響，受前代文學批評承傳關係的制約。明代文學創作的狀況是：作為傳統文學主要形式的詩歌散文，在經歷了漢魏六朝以至唐宋一千餘年的發展之後，已難別開生面，而歷來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學，如戲曲、小說、民歌等，却如日之昇，方興未艾，顯示了蓬勃的生命力。可以說，明代是文學體裁雅俗交替的時期。這一交替必然地給人們的審美觀念帶來新的變化，給文學批評帶來新的刺激。同時在哲學思想方面，明代也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折。一般說來，宋、元、明三朝居於官方統治地位的思想是程朱理學，但自明代正德、嘉靖以後，理學的別支——心學却風靡一時。理學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興起的新儒學，它援佛入儒，重義理而輕事功，帶有內省的傾向。明正德間，鑒於理學末流的支離庸弱，不足以振起人心，王守仁倡「致良知」之說，認為「心即理」，「吾性自足，本假外求」，是為心學。心學之盛，以及伴隨着心學而再度興起的禪宗與禪悅之風，標誌着士大夫的追求由外部世界進一步地轉向內心世界。這一轉變在詩文以至戲曲、小說的批評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此外，幾乎與這一轉變同時發生的是明代中後期社會文化思潮的新變。一種與理學相悖，充分肯

定自我，充分肯定人情物欲的觀念如狂飈突起，瀰漫於整個社會。這一觀念與明代中後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密切相關，反映了新興市民的意識情趣與審美態度，故亦稱爲市民思潮。市民思潮的產生有力地促進了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的發展，也給詩文創作帶來了生氣。明代前期思想、文化沉悶的局面被打破了，出現了中後期文學藝術繁榮的新局面。明代的文學批評正是在這樣多方面的影響下產生並發展的。上述諸種因素交互作用，呈現出一種在歷史轉折時期所特有的複雜面貌與蓬勃生機。其特徵表現爲：第一，受心學的影響，文學批評也側重於內心的探究。這不僅表現在心學一派的文學批評中，也表現在與心學無干，甚至對心學持批評態度的人的文學批評中，顯示出其時代共有的特徵。第二，出於對理學的批判，文學批評中出現了與重理相對立的尊情的主張。同時隨着明代中後期市民思潮的勃興，尊情的主張也越來越帶有新的與封建禮教相悖的異端色彩。第三，因爲傳統的詩文創作在明代已處於衰微階段，因此就指導創作而言，其詩文批評方面復古的論調充塞於文壇。但是，作爲探討總結前代詩文創作的藝術規律，明人的詩文批評却取得了成績。在復古的旗幟下所產生的「格調說」，及爲矯「格調說」之弊而提出的「興象風神」等，均對我國古代詩歌藝術的研究、詩歌史的研究，作出了貢獻。第四，隨着戲曲、小說、民歌的勃興，通俗文學的藝術魅力與社會功能日益引起廣泛的注意。傳統的視戲曲、小說爲旁門邪道的狹隘文學觀受到有力的衝擊。不少有膽識的評論家開始正視這些新的文學體裁，論述或批點戲曲小說的專文、專著不斷湧現，出現了通俗文學評論空前繁榮的

局面。以下就這四個方面分別加以論述。

## 一 文學批評的內省傾向

明代心學家好論文者不多，但作為曾風靡一時的哲學思想，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思潮，心學給予文學批評的影響決不應輕估。它往往並不以具體的批評見解，而以其抽象的思維方式影響於各文學流派。內省傾向正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它漠視客觀的現實世界，而以內心的返照為求得真知的主要途徑，它重一己而輕外物，重冥會而輕實證。因此表現在文學批評上，它與傳統儒家重視社會效果，明道致用，輔君化民的觀念顯然不同。它所追求的可以是一種抽象的倫理道德，也可以是一種個人的生活情趣，或者是某種主觀的精神境界。

(一) 前期文學批評視角的轉變。通觀明代文學批評，宋濂、劉基二人的觀點顯得頗為獨特。宋濂提出「明道」「立教」「輔俗化民」「為文」(《文說贈王生黼》)，以合於儒家先王之教，能經世致用者為理想中的文章。劉基主張「世有治亂，聲有哀樂」(《項伯高詩序》)，故寫文章當能「措大事」，寫詩歌當有「美刺諷諫」的作用。宋、劉兩人的文學觀並不相同，劉基側重「論刺」之說，宋濂側重明道致用，但總的說來都體現了儒家文論的傳統精神，以明道致用為正宗，以美刺諷諫為通變，二者相輔相成。這是漢唐以來歷代皇朝所奉行，也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文學觀念。但是在宋、劉以後的文學批評中，這樣的觀念却

很少得到反映。劉基的主張在當時便顯得較冷清，缺乏遑附的人。劉基死後，在整個明代二百餘年中，同調者亦不多。中間李夢陽、康海、鄭善夫、焦竑等人比較重視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也寫了一些揭露社會黑暗的作品，但主要側重於個人情感的抒發，與劉基論刺的主張仍有較大的距離。一直到明末，在社會大動亂的刺激下，陳子龍才提出了「憂時託志」的主張，強調詩文要「刺讒當時」，與劉基之論遙相呼應。宋濂的情況與劉基有所不同，出於明初開國文治的需要，洪武時期其明道致用的主張還比較風行。當時館閣諸臣如王禕、朱右、胡翰等都和他持相近的觀點。但是永樂以後，隨着其弟子方孝孺被殺，宋濂明道致用的文學主張也很少再被人稱述。明代以理學治國，以八股取士，劉基「論刺」之說不為統治者所歡迎還可以理解，宋濂明道致用的主張為什麼也得不到後人廣泛的響應呢？其原因之一是科舉利祿之途腐化了士人們的心靈，如同薛瑄所說：「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文材料，用於己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讀書錄》卷二）其二即是心學的勃興。鑒於理學、八股的積弊，以及世道人心的敗壞，人們厭棄了道學家虛偽的門面語，主張直指本心，探索內心道德的真諦。因而論文時便很少再談「明道致用」或「文以載道」之類的話。如王守仁論文僅稱：「作文字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錢德洪《刻文錄序說》引）

薛瑄為明代前期著名的理學大儒，然所論已略見心學端倪。他晚年作詩道：「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被稱之為「晚年聞道」（《明儒學案·師說》）。他在《讀書錄》中批評「文學做聖賢之

詞」，喻之爲「中國人學做外國人言語」。這番話自然是針對當時八股取士制度而發的，然所論却把唐宋以來「文以載道」之說也一併否定了。他論學重在一己的體驗，故說工夫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等萬物之間，萬物之理備於心，文辭則是此心之理的自然抒發。本此論文，其主旨是：一，飲食男女無不可道，故詩文的題材也應當十分廣泛。二，不作道學語，而要發之自然，抒寫心中所不得不言者。這觀點顯然和宋濂所主張的宗經師古、明道致用有較大的差距，然而却正是永樂以後、正德之前數十年間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主張。在這期間頗爲風行的性氣詩可以說正是這一主張在文學創作上的體現，而性氣詩的代表作家陳獻章、莊昶的文學批評觀點也與薛瑄大致相合。

(二)唐宋派文論與心學的密切關係。李夢陽與王守仁年歲相當，然以李夢陽爲首的文學復古運動則略早於王守仁所倡良知之學。王守仁少時曾受復古思潮的影響，後乃改弦更張，放棄對辭章的追求，轉向自己的內心，遂倡良知之說。嘉靖間崛起的唐宋派文人如王慎中、唐順之等，其思想發展的軌跡竟亦與之十分相似。他們二人在嘉靖初亦曾受前七子的影響學爲古文辭，後來接觸了王學，思想發生變化，才改而倡唐宋文（見李開先《遵嚴王參政傳》）。最先轉變的是王慎中，他曾在南京聽王畿講解王守仁遺說，遂多有啓悟。王慎中爲學重視內心的體會、本性的探求，以此論文自然不滿於七子派所標榜的古文辭及格調之說，於是轉而宗歐、曾之文，稱曾鞏之文「思出於道德」，「會通於聖人之旨」，「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豐文粹序》），明顯地表露了他論文的內省傾向。



唐順之論文與王慎中略有不同，其重點在「本色」。本色論的中心是：其一，爲文當有「真精神」，也即「千古不可磨滅之見」。其二，當「直據胸臆，信手寫出」（答茅鹿門知縣第二書）。他就「真精神」解釋說：「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千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同上）「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欲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真消息也。」（李開先《荊川唐都御史傳》引）又要「洗滌心源」，又要排除「欲障」，還要好「仁」「好」「德」，這樣的「真精神」其實就是王守仁所倡「虛靈明覺之良知」。唐順之中年以後服膺王學，「於龍谿只少一拜」（明儒學案·南中王門），因此他以良知之說來解釋「真精神」是並不奇怪的。

明白了王、唐二人論文與心學的密切關係，進而對明代唐宋派與唐宋諸大家在文論上的差異也就比較清楚了。唐宋諸大家反對雕章繪句，「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以爲能」，這點和明代王、唐的主張比較一致，但是唐宋諸大家，尤其是唐代韓、柳二家，提出「文以明道」，其精神是「輔時及物」，其所倡「不平則鳴」之說，以諷諭世事爲文章宗旨，十分重視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關係，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傾向，與王慎中、唐順之等「洗滌心源」、「反躬爲己」的觀點自然很不相同。

「唐宋八大家」之稱是明人提出的，比較一下明初朱右的《新編六先生文集序》（以三蘇爲一家）與唐順之的《文編序》，二者對唐宋八家的認識顯然不同。朱右稱唐宋八家之文：「備三才之道，適萬彙之宜，彝倫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奧，上下數千百年國家之興壞，人物之臧否，彰善刺惡，褒是去非，探賾索幽，鉤玄提要。」其經世致用的觀點與宋濂基本一致。唐順之則不然，他於《文編序》中稱：「聖人以神明而達